

檔案編號：OS034

訪談對象：謝三泰（人權雜誌攝影記者）

口訪日期：2012年11月24日

口訪地點：高雄巴慕咖啡

訪談人：嚴婉玲

我是1958年生，澎湖馬公人，1978年來左營當海軍，1981年退伍，之後就留在高雄。我會喜歡攝影是當兵的第一年的事，高中畢業去當兵，我接觸到的同事都是大學畢業的預官，那時候大學生很少，我看他們很喜歡念書，我就跟著念書，但我不知道要念什麼。

我想起父母曾說日治時期經歷過的生活是多麼困苦，對我而言那些是不可能有的記憶或想像的，他們也經歷過白色恐怖的氛圍，我那時就想要追根究柢。

我買了幾本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學，像呂赫若、張我軍、鍾理和、吳濁流，還有龍瑛宗的〈植有木瓜樹的小鎮〉。當我看到楊逵的《送報伙》那本書，我只記得序寫說，希望用筆來用寫文學，用文學記錄台灣歷史，我傻傻的想，我想用相機記錄台灣歷史，所以我就存錢買相機。

澎湖沒有山沒有火車只有海，我就拿著相機開始遊走台灣，1979年美麗島事件我在當兵，軍營中還要特別被訓練鎮暴操，在這個過程裡面，我已經對執政當局產生問號，當兵時看的那些文學其實是禁忌，如果在軍中被查到可能要思想改造，不過我藏的蠻好的。我吸收到日治時期真正的生活背景是在我看到吳濁流的《波茨坦科長》，那本書被禁，我一直想找來看，經過五六年之後才找到由遠景出版社出版的版本。

退伍之後就在高雄工作，同時繼續拍照，那時拍照就慢慢在改變，有接觸到報導文學和文學論戰，看到的東西包括外國的報導攝影，那些書都是盜版的。看這些書會發現他們都是在幫弱勢族群、戰地情況做報導。我因為出身的家世背景，開始對弱勢族群有一些關注，但當時沒有媒體可以發表。

像1986年機場事件、黨外編聯會跟公政會的活動，我就會去看去聽，覺得台灣氛圍在改變。為了這個，我想找一份跟興趣有關的工作，之前的工作都跟攝影沒關係，開計程車什麼的。

1987年我上台北，我第一份工作是《自立晚報》，因為這份報紙的屬性，就接觸到政治、弱勢、環保、勞工等議題，跟我可能也很對味，就這樣在自立待下來，拍了一些跟台灣的民主過程、弱勢族群、社運相關的活動。1987年也

是關鍵年，解嚴，整個台灣過去的進步、衝撞到解嚴，這段時期我們都有碰到。

那時鄭南榕、陳永興發起二二八平反運動，我知道陳永興是台權會會長，第一任是江鵬堅。那時我不懂NGO是什麼型態，我還以為它是民進黨的一環，一直到陳菊接了辦公室主任，聲援馬曉濱那個時候才真正跟他們有接觸，之前我跟陳菊不熟，到1989才熟識，我知道她是美麗島事件的受刑人。我覺得他們不管是政治人權或是社會人權都有努力，我覺得我可以幫忙，但又覺得自己是文盲，只會拿相機。後來又認識李昆澤，在那邊跟他打下比較好的友誼，陳菊畢竟算我的上一輩，因為這樣，我想說或許我在台權會可以幫昆澤一些忙。

昆澤是從宜蘭來的小夥子，還在念輔大夜間部，收入也不好，我偶爾半夜會買一些東西過去辦公室找他，他在編輯雜誌，邊編邊想，我就拿著一疊照片去跟他分享，喝酒吃飯，就這樣認識台權會而有合作。

馬曉濱事件，李昆澤說為什麼對我印象深刻，因為要搶救馬曉濱，我們去搶新聞，還被憲警包圍，不讓我們採訪，那時有一些小衝突，我就拿了相機K憲兵的鋼盔他們嚇了一跳，想說怎麼會有這麼愛好和平維持正義的記者，那當然很複雜，但也是因為現場的氣氛使然。

到後來，台權會為了黑名單人士返國，從設計掩護、宣傳等，那時很多人在幫忙，像簡錫堦等人，後來還有營救許曹德、蔡有全的案子。那時他們辦了很多活動，包括政治犯營救，像AI營救美麗島事件的這些人，也有在整理一些政治犯的事蹟，政治犯受難者聯誼會跟他們也有合作的關係。

我拍了一些照片，剛好也是他們在做的一些報導，我就免費提供，台灣過去的媒體也不是這麼有錢，對於攝影也不是這麼重視，縱使昆澤是好兄弟，陳菊是好朋友，但他們也挪不出錢來，所以不敢要求我無償去執行案子。

只有一次，陳菊知道我們也不是這麼有錢，就跟我說黃昭堂從日本回來，你要不要跟我們一起去拍攝。我覺得以黃昭堂的地位，應該要最後一個回來，沒想到最後回來的是陳南天，我們在日本吃飯，陳南天也在，歐里桑（黃昭堂）就調侃說，他比我還大尾。

在陳菊任內和施明德任內，那個時代台權會援救政治犯比較多，另外還包括退報救台灣等運動，後來黑名單結束，政治犯都被釋放了，所以階段性任務就結束。後來台權會政治人權的色彩比較淡，重視社會人權，陳菊轉到台北市政府工作就離開台權會了。不過更早的離開原因是她下來高雄選國代，1992年

全面改選國代，她下來是因為黃昭輝跟李登輝翻桌，蘇培元、張貴木、黃昭輝被判刑，高雄當時沒有新潮流系統像樣的人物所以陳菊才下來。

我基本上都是扮演配圖的角色，他們需要的照片，我有的我就給。有一段時間，我跟吳密察、前衛出版社社長林文欽，特地去大阪、京都、東京拍了一些在日本的黑名單人士，大約是1988-90。那時拍了一些照片回來，吳密察執筆，我出照片，這些照片有一些也在台權會的刊物裡刊登。我自己後來也有自發性的開始追蹤台灣的政治犯，十年以上的我就追。包括美麗島事件、蘇東啟案我都有去追，拍回來，有些照片好像有給台權會，有沒有用我忘記了，那時他們辦了幾個人權之夜，我有去拍，拍一拍就丟給他們。

我跟被拍攝者在一起都在喝酒，到東京就是跟黃昭堂喝酒，還有宋重陽、黃文雄、連根藤，許世楷不喝酒。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去找許世楷，他一再跟我說，到哪個車站走哪個出口我會在那裏等你之類，就像偵探電影情節。

1987第一天到報社報到，就去報導婦女新知的抗議。那時幾乎每天都有社會運動、抗議陳情，1988的農民五二〇事件，我第一次接觸那個新聞的時候，是半夜凌晨鎮壓，開始打巷戰、游擊戰。我心想這是不是二二八的翻版啊？

農民從早上九點或十點在國父紀念館集結，因為他們的農機農具在高速公路上被扣，就有點延宕，可能十一點才開始走，農民開始有點不爽。出發之後，又沒有按照原來路線走，蕭裕珍拿麥克風又特別容易激情。在立法院有一波警民衝突，下午一兩點一直延伸到台大醫學院基礎大樓，工地的石頭飛來飛去，在立法院就丟寶特瓶。其實是因為基礎大樓有工地，所以才有石頭，剛好鎮暴警察用蛇籠圍在徐州路上，石頭丟過去警察又丟回來。我被K到耳朵旁邊，我一閃就K到後面的人，我還轉過頭去拍。

前半段某種程度你會覺得是民眾先挑釁，當然有誘因，當然也有可能藏一些奸細，台灣當時對這種社會運動沒什麼理解，也不知道對方會用什麼手段，所以才會給人家的印象覺得是農民先挑釁，後來拆警政署的招牌、衝破大門、衝到城中分局，鎮暴警察出來開始追、開始打。後來是台大的學生被踩過去，到那個階段才看得出警察打學生，才有所平反，後來就開始打巷戰。當時新的台北車站還在蓋，民眾就在鷹架那邊圍觀，消防車水柱就這樣往鷹架沖過去，民眾就被沖下來。當天晚上報社開會討論立場是要定義這些人為暴民還是警察打民眾，有一些希望持平，有些是站在民眾這邊，有些站在警察那邊，最後決定是警察打民眾的立場。

那時拍同一張照片，我旁邊可能是《中央日報》或《青年戰士報》的記者

，同樣的角度拍，或有人拍同一張照片提供給不同報社，出現在不同報紙上，就會出現不同報紙的圖說，而且是落差很大的立場。

有一次跟陳婉真的遊行，有路無厝的遊行，那天雙十節，我跟到漢中街附近，到那裏的時候，有一個民眾拿一個彈弓打警察，那種照片我們拍了也不會用，我們某種程度也在維護這些人，我覺得站在台灣史的立場，我是對的。我上課就跟學生說，沒有客觀這件事，記者一定有自己的立場，只是如何包裝得像客觀。影像、文字都會騙人，攝影記者什麼時候要出手、什麼時候要拍、拍了三五張，可能就是你要的你看到的那剎那。

馬曉濱案幾乎所有的行程我都有跟，當作一個記者或者社會公益，你就是一種最後一搏的心態，一個人也對抗不了這麼大的政權，但也唯有這樣做，台灣民主才也許有一絲曙光。這個案子主要是由台權會協助，馬曉濱的妹妹馬小琴從中國來了之後，陳菊一直陪著她走，包括到善導寺、到總統官邸請願、宗教團體拜會。最後要槍決的時候，我們都在台權會，陳菊就很落寞，跟馬小琴相擁而泣，但還是要陪她走完最後一段，包括到一殯火化。最後我們送馬小琴到機場回中國，因為馬曉濱的事件我才跟台權會這麼近，當時幾乎是全程參與。我當然有我自己的定調，我的影像就是要幫馬曉濱，但我不會跟被拍攝者說你要怎麼樣。

之後的台權會，我沒有特別注意誰當會長，我覺得最大的問題來自於，民進黨兩千年執政之後，NGO團體幾乎等於是斷手斷腳或說綁手綁腳，一方面資源就被阿扁拿走了，NGO生存相對沒有以往那麼活絡。現在人權團體分工比較細，例如勞動人權雖然有勞陣等團體在做，軍中人權也有促進會，我知道林峯正做了以後比較專注司法人權。不過我當然對台權會還是有很多期待。